

從

留

學

到

學

留

(上)

留美散記

● 馬大任

十九世紀美國的哲學家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一八〇二—一八八二) 說

：「所有受過教育的美國人都到歐洲去。

」因為那時候只有在歐洲才能得到更高深的教育。

由於同樣的原因，二十世紀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幾乎也都想到美國去。

在抗日戰爭之前，中國的教育制度好像沒有讓一所大學授給學生博士學位，連給碩士學位的科系都不多。所以要想得到更高的教育，必須出國留學，而美國是中國留學生最喜歡去的地方。

抗戰期間自由中國被封鎖在內地，同時政府的財政很困難，留學的獎學金名額很少，出國留學的人數非常有限。抗戰結束之後就有大批學生到美國去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當時到美國來的留學生成分相當複雜

。有少數人是公費的，有些人是公派的，許多是自費的。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自費生都是資產階級，事實上有些人相當窮。但是他們還是可以出國，因為那時候每個通過自費考試的學生都可以用官價買兩千美金，官價是二十個法幣換一個美金，當時的黑市是大約二百法幣換一個美金，所以自費等於百分之九十的公費。

如果一個窮學生真的窮得連官價美金都買不起，他也有辦法出國。他可以把他官價買美金的權讓給一個有錢的學生，那位有錢的就可以用官價買到四千美金，因為官價與黑市的差別很大，所以他一定願意給那位窮學生一千或更多美元作為報酬，這樣那位窮學生也就有夠多的錢到美國來了。

當時留學生中還有一批是在淪陷區的大學畢業的。他們的學位教育部不承認，在國內找工作就比較不方便，所以有必要出國拿一個外國的學位。這些自費生就大都是資產階級了。

荷包滿滿赴美留學

美國描寫一個白手起家而致富的移民路程是「從毛毯到發財。」我的路程正好相反。一九四七年夏天我乘梅格將軍號輪船從上海到舊金山，我口袋裡有三千六百美元。其中三千五百是重慶新聞學院的獎學金，（這可能是當時公費獎學金中最高的），另外一百元是我父母親送給我的。所以在那船上的留學生中，我可能算是一個相當富有的。但是兩年之後，我就需要人救濟了。

那年到美國來的留學生幾乎都是坐船來的。當時來往上海和舊金山之間只有兩條船，梅格將軍號和戈登將軍號。這兩條船戰時原來是運兵船，那時還沒有改裝，每一個床有上、中、下三層。所以那年來的學生不僅可能是同學，還可能是同船，甚至於可能是同床。

與我同船來的學生至少有好幾百。我同我大哥大恢和熊向暉一起坐這條船來。他們兩個人都當過胡宗南將軍的隨從副官，是胡將軍保送到美國留學的。熊到西方儲備（Western Reserve）大學去，大哥和我去了威斯康辛大學。

威大同學關係親切

在沒有到美國之前，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新聞學院就給了我入學證。因為重慶新聞學院是哥大新聞學院與董顯光先生合作辦起來的，所有的外籍教授都是哥大派來的，所有的新聞學的課程也同哥大一樣。我不想再重複念一次，所以就去了威大。

威大在麥迪生城，是該州政治與文化的中心。根據「時代雜誌」那時的調查，這是美國最理想的居住城市。不大不小，

文化與教育的水平相當高，環城是四個湖，城在四個湖的中間。城裡到處是公園，綠化程度很高。環境美，治安好，真是學習與住家的好地方。

威大在美國也算是一個名牌大學，在歷史上同中國也有一些關係。好幾位中國名人是威大畢業的，包括前教育部部長杭立武與前歐美同學會會長趙君邁。美國中國通中的元老之一——亨培克（Stanley Hornbeck），也是在一九〇九年從威大到浙江杭州的洋學堂教書。

中國滿清政府推行洋務運動時，在各省辦洋學堂，請洋人來教書。亨培克就被請到杭州來。他回美國後在國務院主持過多年的中國事務，有「中國先生」之稱。他也是美國遠東學會（亞洲學會的前身）的創辦人之一。

我父親就是他在那個洋學堂的學生，我到美國後就給他寫了一封信，問他還記不記得有一個叫馬公愚的學生？他馬上給我回信說，他不僅記得，而且知道我父親是很有名的書法家。他要我到華盛頓來的時候到他家裡去看他。

威大那時候大約有三十來位中國同學。因為許多人常到湖邊的學生俱樂部去吃

飯或休息，所以見面的機會相當多，同學間的關係很親切。到現在，五十多年以後，還有幾位老同學與我保持聯繫。

了解中國認識美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中國是美國的盟國，戰後中國是四強之一，美國許多人就對中國發生興趣。我到威大不久就有好幾個社團請我去講中國的事情。我當然欣然答應，同時就開始準備講稿。

我到美國來的時候已經二十七歲，在國內已念完大學與研究院，而且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工作了兩年，當過英文周報「重慶新聞」的記者和通訊員，也做過政府的公關工作。我以為自己很懂得中國，美國人也知道我的經歷，以為我對中國一定很了解。但是我一開始寫講演稿就發現我懂得的實在太少了，連有些非常基本的情況都不知道。譬如說，中國比美國大還是比美國小？我知道以前中國比美國大，但是戰後外蒙古不再是中國的一部分，失去了外蒙古以後的中國仍然比美國大嗎？這我就不敢確定了。這樣的問題在國內的時候是不大會想到的，也許以為這是小學生的問題，大人用不著去想。如果不出國，

沒有外國人問起這類問題，恐怕不會想起。「身在國內不知國」的確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這也許就是出國的一個好處。一個人在國內的時候好像是住在一個房子裡，他看不見那房子有多高？是什麼樣子？走出那房子以後，回頭一看才知道那是什麼樣的一座房子。出國給一個人這樣回頭看的機會，所以出國不僅幫你認識外國，也幫你了解祖國。

當然認識外國比了解祖國要困難得多。尤其像美國這樣一個又大、又新、又複雜的國家，同古老的中國的差異實在太大了。來自戰後貧窮的中國，我新到美國來之後對美國人的第一個印象是他們太浪費了。中國傳統的節省美德好像在他們心裡並不存在。後來系主任請我吃飯，他問我對美國人的印象如何？我就問他為什麼美國人那麼浪費？他就同我說，美國人也很節省的，美國人也把節省作為美德。跟著他就向我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的周期性。他說美國的經濟「盛久必衰」，「衰久必盛」。產品太多，賣不出去，就造成「經濟蕭條」。在蕭條的時候，工廠關門，工人失業，許多人就沒有錢買東西。

如果老百姓再節省，再不買東西，生意就更壞，蕭條的期間就會更長，窮人就更多。復興經濟的辦法就是花錢。政府要拿出大批錢來救濟失業的人，花大批錢造路，造房子，大興土木，還希望人民捨得花錢，多買東西，讓鋪子裡的生意變好，多向工廠訂貨，工廠就能多用工人，工商業就都復興了。所以那時候花錢不是浪費，而是對社會有益的行為。

這個理論對一個剛從中國來的窮學生聽起來真是有點像「天方夜譚」。但是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很有教益的經濟課。我很感激那位系主任讓我了解美國的這一方面。

自由與民主的涵意

在同另一位教授談話的時候，我們談到美國的政治。他說美國是一個自由與民主的國家，中國還不是。我就同他辯。我說中國人的自由比美國人的還多。我拿釣魚作例子。威斯康辛州有許多湖，許多人喜歡到湖裡去釣魚，但是州政府對釣魚作了許多規定。首先你要出錢買釣魚的執照，然後你要知道在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可以開始釣什麼樣的魚。如果釣到的魚太小

，還得放回去，因為可釣的魚的大小都有規定。釣魚的五花八門的限制真是要把姜太公都要弄得糊里糊塗，哪裡還有釣魚的自由？在中國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拿起釣魚竿到任何地方不花錢就可以釣任何種類與大小的魚。

那位教授聽了我這套「謬論」之後就給我上了一堂關於「自由」的政治理論課。他告訴我說，個人自由與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人類社會愈進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就愈複雜。如果人際關係與社會關係沒有適當的規定，就會發生混亂和衝突。這些規定看起來好像是限制了個人的自由，其實這是使社會不斷進步，使人民有自由的生活，最好的保障。

他又告訴我自由和民主，雖然有很密切的關係，並不是同樣的東西。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情況，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自由的種類很多，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新聞自由等等。民主是指一種政治制度，一般是指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在一個民主的政體裡也可以有許多自由（包括釣魚的自由）。一個民主的政體也可以使人失去自由。希特勒不是「槍桿裡出政權

」，他是通過民主的投票選舉取得獨裁。這位教授是教新聞學的，不是教政治學的，但是他給我上了一堂很有意思的政治課。

速成論文英文寫作

我在威大只念了八個月就拿到新聞學碩士的學位。我的導師以為我至少要在那裡待一年半。所以當我向他提出要寫畢業論文的時候，他覺得很奇怪。那時候離開畢業典禮只有一個月，他不相信我能在一個月內寫出一篇碩士論文。他勸我先全力準備期考，考完了期考之後，再在暑假裡寫論文。我告訴他我已經從中國帶來足夠的資料，現在不必再花時間找資料，只要把資料整理一下就可以寫出來，而且我把論文的題目都已經選好了，題目是「中國報業裡的美國觀念」(American ideas in the Chinese press)。我問他能不能讓我試一試，看我能不能在一個月內交卷？他說他可以讓我試，但是，如果我把一本厚厚的論文在畢業典禮前交給他，他恐怕沒有時間在典禮前把我的論文看完並改好。他建議我每星期交給他幾章，他看完那幾章就叫我到他辦公室去，我聽他講我寫錯的

地方和改正的原因，拿回改好的幾章重新打字，同時交上新寫的幾章。

過了兩個多星期之後，馬星野先生從臺灣到美國來。他順便要到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去看他的妹妹馬秀權。馬先生是我在重慶新聞學院的老師，也是我哥哥在政校時的系主任，秀權是我中央大學的學姐，馬先生是我父親的學生。我們都是溫州人，所以我們是世交，又是小同鄉。他遠道到美國來，我不能不去看他。我同哥哥就借了一部車子從麥迪生開到聖路易市，來回花了幾乎一個星期。回來以後離開畢業典禮只有一個多星期，匆匆忙忙的把論文最後的幾章趕完，跑到導師的辦公室，連同以前打好的幾章一起交上去。我已經如期完成論文，學校就得讓我畢業。

導師拿到那一百多頁的論文之後的確有點奇怪，一個剛從中國來的學生能在一個月之內，除了準備六門功課的期考外，還能寫出這樣長的一篇論文。他不知道我在中國曾在一個英文報館裡當過一年多的記者，每天要寫英文新聞，而且一定要在截稿前寫好，新聞不一定寫得好，但是寫作的速度比一般的中國留學生要快得多，一個月寫一百多頁並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至於英文的品質，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位導師非常負責，把我的錯誤一個一個的指出並改正，同時說明他改的理由。

最後他對我的英文作一個總的批評。他說我的文法相當正確，錯的地方很少，我的用詞也相當恰當，需要改的地方也不多。我錯得最多的地方是冠詞「the」。有些該用「the」的地方我沒有用，有些不該用的地方我用了。他說這個冠詞的用法很難說清楚，他無法教我，因為有些時候該不該用不是文法的問題，而是習慣的問題，習慣是從小養成的，從講話的習慣裡你學會語言的節奏。有時候用不用「the」是根據節奏來決定，不是土生土長，或者從小沒有良好的講話習慣的人是很難掌握這個節奏。我一直記得這位導師的這句話。現在我已經在國外用了五十多年的英語，寫了不知道多少萬頁的英文信、備忘錄與書刊上的文章，但是愈寫愈覺得自己的寫作能力太差。這個「先天失調」是很難補救的。現在我每年用一封賀年信來替代賀年片，這信是中英合璧的。在我定英文稿之前，總是要送給我三個在美國生長的子女，讓他們看一下，他們總是能把我的稿子改好一點。

入哥大國際關係

拿到了新聞學的碩士之後，我想繼續念博士學位。威大沒有新聞學的博士，其他的大學好像也沒有。後來打聽的結果發現當時美國只有密蘇里大學給新聞學博士的學位，可見這學位就在美國都不很必要，所以我就決定改行。那時候中國正以戰勝國的姿態在國際舞臺上出現，同時寫國際新聞也必須有相當豐富的國際知識，所以我就決定改學國際關係。

我向哈佛與哥倫比亞兩個大學申請入學，他們都收了我，並且都給了我學費獎學金。因為我在紐約有親友，在波士頓沒有，所以就到哥大去了。

哥大的國際關係專業在政法系。全系

的中國學生，包括念國際法的，有三十多人，可能是全校中國學生最多的一系。幾乎所有的中國學生都是念博士或碩士的。其中還有當過教授與大使的老學生。

當時哥大政法系的師資陣容非常強盛。教國際法的是前國際法庭的大法官Philip C. Jessup，教政治理論的是思想家 Robert M. MacIver，教蘇聯問題的是 John N. Hazard，教中國政治的是裴斐 (Nathaniel Peifer)。我也選了教中國歷史的韋慕庭 (C. Martin Wilbur) 的課。這兩位都是當時美國很有權威的「中國通」。

哥大與中國的關係非常密切。中國過去許多名人，如胡適和馬寅初，與當代名人，如張京育、吳舜文、唐德剛和張旭成等，都是哥大畢業的。許多名學者和科學

家，如吳健雄、李政道和夏子清等，在哥大教過書。許多名人與學者，如胡佛、嚴家其和康寧祥等，在哥大當過訪問學者。我曾經在一本當時的英文中國年鑑的名人錄上作過一個調查，發現留學美國的名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哥大畢業或同哥大有關係。這樣密切的關係，加上哥大的學術地位，也許是為甚麼有那麼多中國學生來念國際關係的原因。

我是在一九四八年到哥大來念國際關係的。但是，第二年，一九四九年，中美的關係就沒有了。這就嚴重地影響了我和同系的中國同學的學習。後來絕大多數的同學，不是放棄學習，就是改行。我知道後來好像只有四、五位同學完成博士的學業，拿到學位。(未完待續)

中外文庫 之三十一

粵海舊聞錄

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蘇東坡、王陽明、李鴻章、梁鼎芬、胡漢民、汪精衛、蘇曼殊、陳璧君、朱家驊、梁寒操、葉公超、章太炎、王寵惠、張作霖、張學良、蔡公時、黃晦聞、湯覺頓、馬超俊、丘逢甲、陳辭修、俞鴻鈞、張蔭麟、陳濟棠、龍濟光、史堅如、孫科、廖仲愷、徐宗漢、傅秉常、張競生、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趣談二百多篇、字字珠璣、篇篇精彩、美不勝收。上下冊合售二五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帳局戶。

祝秀俠教授著
全一冊售新台幣二五〇元